

# 马克思 1848 年法国革命研究 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

闵超

**【内容提要】**马克思在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历史考察与规律叙事中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这种“转向”包含三重面向：唯物史观的总体叙事实现了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嬗变，涉及马克思从发现历史规律到运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还原历史事实、揭示历史之谜和预见历史趋势的深入过程；唯物史观的理论视位完成了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的转换，马克思站在“社会形态”高度分析法国这一典型“国家形态”，敞显了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道路；唯物史观的作用机制实现了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的深化，彰显了唯物史观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理论功能，为无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马克思 1848 年法国革命研究确证了唯物史观是在面向现实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实现具体化并且持续推进的科学理论。

**【关键词】**马克思 法国革命 唯物史观 《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作者简介：**闵超（1999-），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杭州 310058）。

1848 年法国革命研究在马克思思想进程中占据至关重要的理论地位，其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在时间节点上，1848 年革命浪潮在欧洲历史性爆发，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而且马克思亲身参与革命实践；在思想进展上，马克思这一时期首次将唯物史观应用于现代历史阐释，他连续创作《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sup>①</sup>，勾勒和呈现出他关于政治革命的理想图景；在叙事风格上，这两部著作融合了哲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评论相结合，具有极好的可读性，极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这些多维视角的特殊性赋予 1848 年法国革命研究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重要意义，典型表现为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一是实现了唯物史观总体叙事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嬗变，二是推动了唯物史观理论视位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的转换，三是实现了唯物史观作用机制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的深化。深入研究马克思 1848 年法国革命叙事与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不仅有利于理解现实革命斗争对马克思思想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利于把握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演变，更能深刻领悟马克思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崇高品格和人生旨趣。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2CKS004）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32 页。

## 一、唯物史观的总体叙事嬗变：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

唯物史观具体化需要在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进行考察与揭示。1848 年法国革命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总体叙事转向的现实催化剂，也成为其理论成熟的实践检验场。在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将理论探索局限于“一般原理”的整体性建构和体系化阐释，而是深入“历史具体”以解开“历史之谜”。就马克思思想进展而言，这一时期他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已然成熟，运用唯物史观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唯物史观成为他突出的理论任务和思想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序言中表达过对教条化“套用”“一般原理”的拒斥，他们指出，无论社会现实发生何种变化，《共产党宣言》阐述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和科学的，但“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①</sup>。恩格斯晚年在对唯物史观的重述中，回应了当时德国青年作家将唯物史观“一般原理”教条化的误解。恩格斯在 1890 年 8 月 5 日写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许多青年作家将“唯物主义”视为一个“标签”，而忽视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sup>②</sup>。这种解读倾向将唯物史观视为脱离经验现实的形而上学理论，简化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从而将其抽象化为“超历史”的教条主义公式和“万能钥匙”。作为一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和“历史具体”之间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或相互对立，而是一种理论推进和实践深化。马克思始终强调回归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过程”，要求从“一般原理”上升或走向内蕴独特历史意识和历史观点的“历史具体”之中。

马克思在 1848 年革命之前建构的唯物史观“一般原理”集理论继承、社会批判和革命建构于一体，既包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性继承和本质性扬弃，也涵盖对社会现实及其观念形式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更是在人类解放的历史高度上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在理论继承方面，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康德的实践理性哲学、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谢林的自然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也包括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唯物主义等，唯物史观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精华的积极汲取和思想荟萃。在社会批判方面，马克思一方面在直面“物质利益难题”、反思“犹太人问题”和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等现实问题中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另一方面在与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思想交锋中明确阐发了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sup>③</sup>，这种阐释原则意味着其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分野。在革命建构方面，马克思将真正的批判和革命建立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对现代国家的批判的分析，同时也是对迄今为止的政治意识的消解，这种政治意识最普遍、最终的表述就是黑格尔的法哲学”<sup>④</sup>）批判之上；相较于家庭和市民社会，黑格尔视域中的国家作为“自由的实现”具有普遍性，“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统合于国家”<sup>⑤</sup>；马克思革命性地提出唯物主义国家观，通过重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马克思系统考察了人类社会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的所有历史，确立了“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8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44 页。

④ [德] 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 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第 131 页。

⑤ [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90 页。

体认识，提出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政治理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系统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指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这些内容共同构成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始终关注社会现实、回应时代之问、切中现实之需的科学理论，其“一般原理”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演绎和“不接地气”的真理。在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之后，马克思立刻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具体社会历史，“通过把握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来描述社会历史的各种运动并揭示其本质”<sup>①</sup>，从唯物史观的原理阐发走向具体运用。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展现出唯物史观走向历史具体的基本路径”<sup>②</sup>。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恩格斯高度评价和肯定了马克思发现的历史规律，认为其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就如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还揭示出这一规律构成“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sup>③</sup>。唯物史观总体叙事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嬗变，就是马克思从发现历史规律到运用历史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还原历史事实、揭示历史之谜和预见历史趋势的过程。关于唯物史观“历史具体”叙事的讨论，存在一个需要明晰的前提性问题，即唯物史观中的“历史具体”并不是指简单的、具体的、过去发生的事件，而是指向“活的历史”<sup>④</sup>，即这一刚刚发生的“活的”正在进行的历史，其范围不包括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历史和资本主义发生史等过去历史的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注重过去的历史，“历史具体”本身已然内蕴对过去历史洞悉的基础之上对“活的历史”这一刚刚发生或正在进行的历史的本质把握，这种叙事展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历史的预见性洞察。

唯物史观总体叙事嬗变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如何运用历史运动规律分析“历史具体”即1848年法国革命这一“活的历史”的问题。依循马克思历史规律的理论逻辑，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叙事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历史事件的解释逻辑上，马克思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视为阐释“历史具体”的基本遵循，既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sup>⑤</sup>，又在特定的经济结构内强调“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sup>⑥</sup>。二是在历史事实的还原上，与同时代思想家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事件研究的比较分析中，马克思既批判雨果过分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而将路易·波拿巴这一小人物描写成巨人，又拒斥蒲鲁东陷入“历史环境决定论”这一“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的误区而把历史变成对政变主角的辩护。马克思秉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揭示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sup>⑦</sup>，由此，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构成“历史具体”阐释的规范性原则。三是在“历史之谜”的回应上，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以黑格尔的历史反复问题开篇并贯穿全文，他通过“人创造历史”的悲喜剧叙事回应了历史反复，揭示出黑格尔视域中“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的反复”源于理性支配世界观念的唯心主义症结，而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历史反复不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简单重复，其指向历史规律作用下历史现象的相似性特质，这完全是人民群众作

① 吴晓明：《唯物史观的阐释原则及其具体化运用》，《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夏莹：《从政治到社会：马克思走向历史具体的基本路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当代阐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9页。

④ 刘奔：《从“活的历史”研究中掌握活的马克思主义——纪念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发表140周年》，《哲学研究》1992年第6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0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为历史创造者和社会变革决定力量的历史结果，由此，群众史观构成“历史具体”阐释的内在线索。四是在历史趋势的把握上，马克思预见法兰西第二帝国必然失败的历史结局，即“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sup>①</sup>，这一预见不仅体现了他对路易·波拿巴开历史倒车行为的批判和讽刺，也反映了他对历史进步的深刻意识和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历史进步构成“历史具体”阐释的必然性规定。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唯物史观的“历史具体”叙事要求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秉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相统一的阐释原则，坚持群众史观的内在线索，站在历史进步的理论高度，从而实现对历史的科学认识和透彻分析。

唯物史观总体叙事从“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转变彰显了其“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自觉”<sup>②</sup>。这一“哲学自觉”意味着唯物史观自始至终包含着揭示历史规律和通达人类解放的理论追求，唯物史观并非拘于宏大的“一般原理”叙事，“一般原理”本身蕴藏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与开掘，而“一般原理”到“历史具体”的转向更是直接深入历史的深层、直面现实问题以及敞显历史的未来向度。

## 二、唯物史观的理论视位转换：从“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

唯物史观总体叙事的嬗变必然引发理论视位的转换。“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都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规律的具体表现，而“社会形态”到“国家形态”的转换反映了唯物史观理论视位的重要变化。这一转变在 1848 年法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凸显出来，它不仅推动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深入考察，也明确了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对无产阶级革命持乐观态度。但法国 1848 年革命，尤其是法国“六月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打破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促使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诉诸“无产阶级专政”。唯物史观理论视位的转变是马克思在革命政治视角下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某个具体国家的现实问题”<sup>③</sup>，在此基础上他以法国为典型代表，详细考察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制度、国家机器以及军队等，提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思想以及建设具有真正民主性质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构想，为其他民族国家发展提供思想启迪。

首先，“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借鉴地理学中“地质层”理念创造的关于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标识性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根据“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划分“社会形态”，认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所有制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sup>④</sup>，这构成了社会形态理论的最初样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基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对社会形态予以进一步阐发，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sup>⑤</sup>。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所有制关系”维度论证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⑥</sup>。在此之后，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78 页。

② 孙正聿：《为历史服务的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年，“自序”第 2 页。

③ 唐正东：《唯物史观具体化：马克思的探索及其意义》，《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

④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1-522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02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 页。

物史观的理论视位开始转向“国家形态”，但是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再关注“社会形态”或放弃对“社会形态”的宏观分析，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推动“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的有机融合。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从“人与物的关系”视角出发，勾勒出“社会形态”从“人的依赖性”社会向“物的依赖性”社会，以及最终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的演进历程，还深入探讨了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这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持续建构。不过此时马克思已然将研究重心和聚焦点从单纯的“社会形态”研究中适度转移出来，转而在探究“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上走向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的研究，以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

其次，“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性与“国家形态”理论的具体性之间具有辩证张力。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其理论的误解予以批驳，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中“所谓原始积累”一章所描述的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sup>①</sup>的歪曲。马克思运用历史发生学的辩证方法，明确了西欧资本主义运动“历史必然性”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强调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及农村公社历史走向的研究必须基于特定“历史环境”并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依循“一般社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他集中精力研究的是其所处时代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解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②</sup>。他对具体个案的研究旨在阐释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经验启示，而非为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一般性道路。任何思想家都无法凭空展开关于世界历史的构想，其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他们生存的现实生活世界和根深蒂固的民族观念的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的烙印和特征。马克思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构想中一直都努力克服和超越主观因素的局限，将社会主义运动置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广阔视野中进行思考。尽管马克思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具体案例，研究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但其理论已然彰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统一性与社会变革道路多样性的辩证意蕴。马克思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社会形态”与“国家形态”之间辩证关系的理解，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马克思在1848年将目光投射到具体国家，其理论视域向国家的转变突出表现为，分析阶级斗争视角下法国的政权形式变换与无产阶级革命维度中法国的未来历史走向。

再次，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理论高度透彻剖析了法国1848年至1851年的“国家形态”面貌。“社会形态”首次出现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中，马克思使用这一概念用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于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的革命性意义，指出“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sup>③</sup>。1848年的法国革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革命并没有发挥出其面向未来的价值功能以推动法国社会获得“新的内容”，反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sup>④</sup>，法国陷入“不断‘下降’和‘循环’的政治怪圈”<sup>⑤</sup>。马克思通过“社会共和国”的理论构想破解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4页。

⑤ 王志强：《循环、下降与僭主——1848年法国革命的政治哲学批判》，《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这种“政治怪圈”背后的谜团，从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视角透彻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治方案，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诉诸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资产阶级国家本质的揭示中，马克思认为，法国“六月起义”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sup>①</sup>的工具，因为共和国本身只是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变革的外在形式，并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存在形式，所以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一切国家机器和秩序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和资本的无止境增殖而设置的。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历史推进上，马克思考察了法国历史上发生的诸多革命，发现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历史运动，抑或是议会制共和国的政权形式，都未能动摇专制君主制时期形成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得出了“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sup>②</sup>的结论。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必须彻底摧毁旧有的行政权力结构。这一思想被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sup>③</sup>。在“社会形态”的理论高度和历史维度上反思资产阶级国家形态，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阶级统治的本质，也展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理论形态。

最后，马克思以法国“国家形态”为现实案例，敞显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未来空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通过对法国波拿巴主义国家生成历史和未来进路的分析，认为“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sup>④</sup>。马克思在这里对法国波拿巴主义国家这一“国家形态”的判断源于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深刻洞察，对“国家形态”的思考不仅彻底走出了黑格尔法哲学视域下国家是“世上行进的神”<sup>⑤</sup>的理性桎梏，还打破了他青年时期形成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单向度的思维模式”<sup>⑥</sup>，认识到了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能动作用，这是国家自主性的呈现和实际运行。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国家自主性的思考与国家的阶级性密切相关，指出国家的阶级性和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动态平衡和一定张力。当国家的阶级性过分突出时，可能会发生阶级性吞噬自主性的状况，波拿巴主义国家呈现的正是一种虚假的国家自主性，而真正的国家自主性的表现是阶级性推动自主性，这是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的理论探索。按照这一思路，马克思在 1848 年法国革命之后持续投身于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国家解放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以法国巴黎公社为蓝本，系统阐释了“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从政权设计、制度运行和权力监督等多重维度勾勒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具体样态。但马克思对未来“国家形态”的思考并非一成不变，他只是借助巴黎公社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般性原则，作出关于未来“国家形态”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展望，强调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以具体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为准则，为民族国家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全新“国家形态”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 三、唯物史观的作用机制深化：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

唯物史观的作用机制指向唯物史观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唯物史观能否充分彰显其鲜明的理论品格，而且涉及唯物史观能否彻底实现其内蕴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47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5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34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65 页。

⑤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388 页。

⑥ 孙乐强编著：《〈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112 页。

统一的“批判的武器”功能。唯物史观自诞生之日起就内蕴“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但这种功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其可以立即发挥作用并对人类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造，功能的实现存在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理论向实践深化的历程。唯物史观在自觉回应社会理论问题和现实难题中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历史性变革”<sup>①</sup>。1848年法国革命成为这一转变的现实契机和推动力量，马克思在对法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中，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既要通过“革命的实践”推动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要让科学理论在介入革命斗争之中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社会批判与革命斗争是唯物史观的两种重要作用机制。无论对唯物史观的作用机制持何种态度与观点，学界普遍认可这两种作用机制的存在和功能，一方面，唯物史观在社会批判中回应各种错误思潮，持续为社会主义“正名”；另一方面，唯物史观深入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发挥其“改变世界”的真理力量。学界在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讨论中基本都笼统地将两者关系概括为“统一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解释唯物史观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强调了不可放弃理论与实践之统一关系的观点，虽然抓住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却相对忽视了在这种统一的关系之外，两者之间并非一直同时发挥作用而是存在某种内在张力。从马克思文本内容的思想逻辑看，唯物史观的两种作用机制呈现出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的历史性深入，其在对以往思想家关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关系的理论认知和基本阐释的反思中走向社会历史的深处，这种“深”在于从社会批判的认识层面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真正能够“改变世界”历史活动的本体论高度。但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搁置或抛弃了社会批判，而是表明唯物史观的作用机制不止于“批判旧世界”，还在积极介入革命斗争实践中“发现新世界”，不仅在于对时代问题的精准把握和彻底的理论批判，更在于参与革命斗争的合法性与展开理论指导的科学性，从而体现了唯物史观作用机制的进步和深化。

唯物史观一经生成马克思就通过批判当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来发挥其社会批判的作用机制和功能。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新世界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蒲鲁东唯心主义经济学，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透彻分析了当时社会主要存在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唯物史观社会批判的作用机制在《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得到集中呈现，马克思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武器，对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予以科学考察，透彻分析了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实质与社会危害，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它们的理论界限的同时高扬了科学社会主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形形色色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予以整体性审视，总体上划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类。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生成的社会根源与历史语境。在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各种标榜社会主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起，在诸多社会主义思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1516年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中的空想社会主义图式。因为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制”，在资本私有利益的驱使下资本主义根本无法克服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矛盾难以克服与无法解决的社会发展困境构成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产生的根源。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阶级实质。其中“反动的社会主义”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甚至企图开历史的倒车；“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表面上宣传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现实中却拒绝实际性的

<sup>①</sup> 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实践的方式》，《哲学研究》2021年第12期。

革命运动，试图通过社会改良形式达到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sup>①</sup>，虽然看到了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状况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内蕴的瓦解因素，但是没有看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反而狂热迷信自身的空想理论体系可能具有的奇异功效。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当时各种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虚假性和阶级性，实现了“外在批判错误思潮和内在证成科学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sup>②</sup>，同时也意识到对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不能真正解决现实世界中工人运动的困境，必须让唯物史观介入具体革命斗争实践来发挥“改变世界”的力量。

1848 年法国革命构成唯物史观作用机制从批判错误思潮到介入革命斗争转变的现实要素。这一转变关乎唯物史观理论“面向现实”与“切中实践”的方式。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哲学理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问题。他在讨论“德国哲学是否应该谈论现实的宗教问题”时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sup>③</sup>，这不难“神会”马克思对德国哲学总是孤芳自赏、脱离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他认为德国哲学的革命精神总是囿于“头脑”之中而不能承担起“改变世界”的现实任务。其中康德哲学展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代精神，被马克思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具有强烈认同感，他把法国革命视为“光辉的黎明”，盛赞拿破仑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聚焦从思想、精神或意识的统治权视角把握法国革命，因为没有置身于社会现实之上而只能陷入“解释世界”的观念论循环。不同于康德和黑格尔从理性层面阐述法国革命，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关注始终聚焦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现实运动。他在对自身唯物史观的建构过程中极为重视社会现实因素，要求自身的理论之思与现实之问保持同向同行，在切中实践中找到唯物史观与社会现实的有机接口，不断追问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使命问题。1848 年法国革命给予了马克思走进和参与革命斗争的现实路径。他高度评价巴黎“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sup>④</sup>，是蕴含无产阶级解放和消灭私有制意蕴的伟大历史斗争。马克思在对 1848 年法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中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具备科学理论的指引，因为在“革命的失败”中灭亡或消失的并不是革命本身，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sup>⑤</sup>。这就意味着唯物史观介入革命斗争不是简单的理论运用或“套用”，而是要真正发挥出改变“传统的残余”的实质性力量，真正实现“消灭私有制”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任务。

唯物史观介入革命斗争的实现方式是不断“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sup>⑥</sup>。唯物史观介入革命斗争不是理论的纯粹工具性应用，也不是直接发挥“改变世界”的理论能量，而是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sup>⑦</sup>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指引、方法策略与现实道路。一是确立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革命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初步理论表达，其中“革命”一词内蕴双重意义，既具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式“空论的社会主义”理论界限的含义，也包含着对无产阶级的思想革命和革命主体意识培育的主观意图。在马克思看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64 页。

② 王宁：《外在批判与内在证成：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理论面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6 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1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0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27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8 页。



“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sup>①</sup>，这种专政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及其观念和重建个人所有制。二是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合唱”<sup>②</sup>的方法策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个阶级的“孤鸿哀鸣”，必须诉诸无产阶级革命的“合唱”，这种“合唱”不仅要求建立“工农联盟”，更要求争取和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合力”。三是探索建立“社会共和国”的未来进路。社会共和国最初在二月革命时期“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sup>③</sup>，其结果却是被扼杀在法国“六月起义”的血泊之中。但是，作为一种极具真理创见的民族国家形式不会因为某一时刻的失败而隐入历史尘埃，相反它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反复出现于路易·波拿巴所构造的大型政治历史剧中，其核心诉求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不仅要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更要彻底终结阶级统治本身，巴黎公社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国家形式。唯物史观介入革命斗争的作用机制，恰切地表明了“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sup>④</sup>的理论旨趣，其中“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意味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之于“改变世界”的解释力和洞察力，“现实趋向思想”则意味着“革命的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实现唯物史观叙事所描绘的理想图景。

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研究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具体化转向，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整全性实现，而是历史性、具体性和过程性的有机统一，涉及总体叙事的嬗变、理论视位的转换和作用机制的深化。在唯物史观的总体叙事嬗变上，实现了从“一般原理”阐释到“历史具体”考察的转向，在运用一般历史规律分析历史和通过历史事件检验历史规律的双向互动中走向“历史的深处”。在唯物史观理论视位的转换上，马克思从“社会形态”的理论高度考察法国这一独特的“国家形态”，以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样板敞显了民族国家发展的未来空间。在唯物史观作用机制的深化上，推动了唯物史观从“解释世界”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相统一的历史性进展，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前提下，描绘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叙事。当然，提出唯物史观具体化转向的三重面相，不可能呈现出唯物史观具体化的全部理论图景，也无法完整还原法国1848年革命带给马克思的思想启迪，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理解法国1848年革命与唯物史观关系的可能性方案。这一革命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勾连仍旧需要在持之以恒的学术研究和历史审思中予以更进一步、更为深入的开掘、发现和敞显。

#### 参考文献：

- [1] 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2] 杨耕：《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 [3] [德]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

(编辑：张 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3页脚注①。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